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4~35

2014年8月6日

孔子不等于“孔家店” ——孔子思想中的“民主”、“仁学”等积极因素 是怎样被改造成为“孔家店”的

李凌

孔子思想有民主因素，有根据吗？有根据。当然，这个民主是打上引号的“民主”。它不是现代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意思（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非历史主义的），孔子的“民主”只是指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提倡听取不同的意见。

试看《论语·子路》记载：鲁定公问孔子，有没有一言而丧邦的。孔子回答说：国君之言，“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黄式三评语：“言莫予违，则谗谄所蔽，祸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丧国之祸，多由于此。陆敬舆所谓天下大患，在于下情不通，所谓失于戒备，逸于居安，惮忠鯁之拂心，甘谗诈之从欲，不闻其失，以致大失

也。”评语说得很透彻。

孔子的这句话，是否是一时的偶兴呢？不是的。在思想方法上，他是一贯反对一言堂，要求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的，他以身作则：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但他把孔子的话当作“句句是真理”，从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对此，孔子是不满的。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论语·先进》以下引自《论语》的，只注篇名）有一次，子夏问诗，孔子回答以后，子夏能进一步发挥，孔子十分高兴，说：“起（启）予者，商（子夏）也。”（《八佾》）承认学生的话，对自己有所启发。

又一次孔子带着学生经过另一个学生子游管理的武城，听见了有弦歌之声，孔子微笑着批评子游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管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不必弦歌学礼乐。子游就用孔子自己讲过的话反诘他。孔子当即承认错误，说：“偃（子游）之言是也，前言戏之矣。”（《阳货》）

又一次，孔子说错了话，别人提醒他，他马上说：“丘有幸，苟有错，人必知之。”（《述而》）

最有趣的是“子见南子”这一章。“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23个字的短章，可谓绝妙好词，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此时孔子正和他的弟子们访问卫国，时卫灵公在位，南子是他的夫人，美而淫乱，在外面名声不太好。孔子应邀见了她，学生子路就很不高兴了，怒形于色，可能还出口批评了他，所以才逼得为师的孔子指天发誓，可能还红着脸说，如果我有什麼邪心、邪念，让老天爷惩罚我！惩罚我！此章见于《论语·雍也》，而不是其他人的杂记，应是十分可靠的事实。从此章看出，学生们尊敬孔子，但也可以批评甚至责备他，逼得他不得不指天发誓。

上述这些材料也说明，孔子本人是愿意接受批评的，发现了错误马上就能承认。夫子“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他反对主观臆断、武断、僵化固执和自以为是。他主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然后做出判断，而且要“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

孔子曾位居大司寇（并曾摄相事），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知识丰富的名人，许多国的国君和当时著名的人物都曾向他请教。但他仍然很谦虚，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即见了道德高尚、知识丰富的“贤人”就要向他“看齐”（即努力学习他），见了不贤的人就反思自己有没有和这个不贤的人相同的缺点，要加以克服。

他还有辩证的思想：“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他承认自己无知，“空空如也”，他从提问的人的实际出发，对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把问题阐发明白。

这些观点对后世以至当代都很有意义。

请再看下面一段《左传》中关于郑子产的文字：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论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他的这套理论和现代西方某些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相仿，这个理论把社会比作一个汽锅，汽锅必须安

一个安全阀，当汽锅内压力到一定程度时，阀门就会自动排气，以减轻汽锅内的压力，否则，汽锅就会爆炸。同样道理，国家也应如此，应该让人民有自由批评行政当局的权利（排气）。有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否则，问题成堆，积累起来，就会爆炸。这套理论没有提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个根本问题，但从管理学方面，是很有价值的。两千年前的子产就认识到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对此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仲尼问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¹

孔子一向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是不轻易以“仁”许人的。他的最得意的弟子是颜回，但孔子说颜回只能是“其心三月不违仁”，至于其他的学生就只能偶尔有点仁心了。又如：“子贡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圣”是“仁”之顶点，这样的“仁”连尧舜也未必达到，而孔子因子产“不毁乡校”，就认为子产为仁，说明孔子非常赞赏子产的思想 and 行为，也说明，孔子思想中的“仁”的概念，不只包括“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内容，而且也包括政治上的宽容、不要钳制舆论的道理。

孔子的思想中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他主张尊王室，强公室，主张保持上下尊卑的等级剥削制度。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激烈的阶级对抗，人的价值逐渐被认识，民本思想逐渐萌芽。这在孔子的前驱管仲和子产等人的言行中已有表现。孔子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的“仁”的学说。仁，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 109 处提到仁字，是孔子谈得最多的问题。何谓仁？说法不尽相同。但最基本的是承认人的价值，要

¹ 《左传·襄公 31 年》。

求尊重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泛爱众，而亲仁”（《子罕》）。过去有人说，孔子说的“人”，是专指奴隶主贵族，而不包括劳动者。这是不对的。例如“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这表现了孔子重人轻马的思想。这里的“人”当然指养马人一类的劳动者，而不是贵族。养马人当时称为“圉”，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当时的社会等级次序是：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圉、牧。士以上是奴隶主或自由民，皂以下是奴隶。而圉则是奴隶的最下层。据《智鼎铭文》记载：当时五个奴隶才能换一匹马和一束丝。奴隶的地位是很低贱的。这一章说明孔子对“人”的尊重。孔子还把爱人作为治国的原则。“子曰：‘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学而》）。他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治国的最高标准（圣），连尧舜也未必能做到（《雍也》）。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百姓的利益和国君的利益是一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因此，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他反对过分的徭役和剥削。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他的弟子冉求为富于周公的大贵族季氏“聚敛而附益之”，孔子非常生气，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其爱憎态度是异常鲜明的。他还强调“使民以时”（《学而》）。他说：“苛政猛于虎也”。他反对人殉，把象征人殉的俑都看作是“不仁”，他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

这些，都是孔子重视人的价值的表现，是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五四时期，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抨击孔子，他认为孔子是提倡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吴虞说：“孔氏之徒，湛心利禄，故不得不主张尊王，使君主之神圣威严不可侵犯，以求亲媚。”因此他提出要“打倒

孔家店”。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有振聋发聩的伟大作用，吴虞是五四运动中的闯将，他猛烈向封建礼教冲击，是有积极贡献的。但他认为“孔氏之徒（孔子等人）”主张尊王，使君王之神圣威严不可侵犯，则是一种误解，他没有把孔子的思想和后儒对孔子思想的改造区分开来。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² 如前所述，孔子的仁学思想恰恰是主张重视人，要求把人当作人。这和专制制度的原则是正好相反的。

认为孔子提倡君主专制主义的人往往拿孔子答齐景公的一句话为依据。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其实，孔子说这句话的本意是为了“正名”，即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名实相符，各尽自己的职责。至于这些职责是什么，当时孔子没有说明。因此，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齐景公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安得为食诸？”他认为臣、子对君、父的职责就是纳粟，这是一种解释。汉儒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认为，君、父、夫对臣、子、妻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又是一种解释。唐代大文豪韩愈也附和这种说法。他在《原道》一文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则诛。”如此等等。因为，这些解释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历代君主都乐于采用和宣扬，并把这个观点，强套在孔子身上，其实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在孔子时代，忠字主要并不表示只是忠于君主，更不是愚忠。统观《论语》，提到“忠”字的有 15 篇共 17 处。其中谈到忠君的只有两处。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1 页。

一处是《为政》篇提到“孝慈则忠”。包咸注：如“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忠矣。”这里，首先要求国君下慈于民，然后民才能忠君。另一处见《八佾》篇：“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样，臣事君以忠，也是要以君使臣以礼为先决条件。在《论语》中，孔子从未说过臣下要盲目顺从君主，君主对臣下可以生杀予夺的话。相反，孔子认为，国君之言，“如不善而莫之违也”，就有可能导致丧邦之祸（见前引《子路》）。对君臣两者的关系，孔子首先要求当国君居上位的要守礼，要以身作则。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颜渊》）。“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他还说：“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认为，当国君居上位的必须“好礼”，必须“修己”，才能使下面心服，才能安百姓，否则“虽令不从”也。

臣事君怎样才能算忠呢？应该承认，孔子有尊君的思想：“君有召，不俟驾行矣”，“入公门，鞠躬如也”（《乡党》）。孔子认为这是臣对君应有的礼仪。但在君臣的实质关系上，孔子并不主张臣子对国君要盲从愚忠，他更反对阿谀取媚以逢君之恶。对那些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鄙视的。孔子说：“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就是说，事君以正道，若君所行有过失，即应以道谏正之，如不听即去位不仕（止）（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孔安国注：“事君之道，义不可欺，当能犯颜谏诤”。就是说，臣子不可欺骗国君，如发现国君有不对之处，应犯颜直谏。这就是孔子主张的事君之道即忠君之道。如果不能这样做，那就不过是“具臣”罢了（《先进》）。所谓“具臣”，

孔安国注：即仅“备臣数而已”。

如果国君失德，又不听劝谏，臣子该怎么办呢？孔子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包咸注“卷而怀，谓不与时政。”（《卫灵公》）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吾道不行，乘桴浮诸海。”（《公冶长》）这些都表达同一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认为：“邦有道，谷（孔安国注：‘谷，禄也，邦有道，应出仕食禄’）；邦无道，谷，耻也。”（《宪问》）“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孔子自己也是这样实践了的，当他看见季桓子和鲁君接受了齐国的女乐，知道在鲁国不能行其道，便抛弃了大司寇的高位，率门徒周游列国去了（《微子》）。

一般说来，孔子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但是如果遇到像桀、纣一类的暴君，该怎么办呢？在《论语》中，不见孔子直接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对起兵消灭暴君商纣的周武王和周公表示极端的钦佩崇敬。孔子所主编的《诗经》中的《大雅·大明》篇就是极力歌颂武王伐纣的赫赫战功的。孔子还说过：“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段是《荀子·哀公篇》引孔子的话，虽不见于《论语》，但却是孔子民本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对后人（如唐太宗）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思想，到了孟子，又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他当着梁惠王的面指出：一方面国君和贵族“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另一方面，“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梁惠王》）。孟子将“仁义爱人”作为人君必备的条件。他说：“仁也者，人也”（《尽心下》）；“杀一无罪，非仁也”（《尽心上》）。他反对不仁者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对此，臣下该怎么办呢？“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尽心下》）。

孟子明确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他比孔子更进一步，明确肯定对桀、纣一类暴君征诛的合理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些正是孔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中光辉的一页。因此，把孔孟说成是我国君主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是与实际不符的。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当时列国纷争。许多诸侯为了富国强兵，克敌制胜，都广揽人才，礼贤下士，广开言路，以为己用。“尚贤”已成为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这就是能够开展百家争鸣的社会政治背景。士（臣子）对国君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诸侯中，专制暴君是有的，但是产生系统的君主专制思想的社会政治条件还没有成熟。当时很多思想家认为：如果国君失德，臣子可以驱逐他。鲁昭公为季氏所逐而死于国外。晋的史墨评道：“鲁君世失其德，季氏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逢，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确实是当时流行的思潮，同孟子关于民贵君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的论调是很相似的。

一直到战国后期，诸侯百国只剩下七家，强秦崛起，大一统的局面逐渐形成，于是产生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思想的需要。韩非集法家之大成，绝对忠君的学说这时才应运而生。他主张“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即便像桀、纣一类的暴君，也是不能反对的。他说：“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他认为臣子一切都应顺着君主，要绝对服从。这和孔子的“勿欺也，而犯之”的观点，和孟子“诛一夫

纣矣”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韩非的这套理论，大得秦始皇的赞赏。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看了韩非的书，秦王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思想成为秦始皇推行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这说明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纲”理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源于韩非，并非源于孔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实，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孔子的学说并不适合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

当然，孔子这一套仁学思想只是反对对下层进行过度的徭役和剥削，要求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以缓和阶级矛盾，以便“易于使民”（子曰：“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见《阳货》），对统治阶级长远利益是有好处的。但即使这样的理论，也是很难为后世的君主们由衷接受的。后世的君主们，为了满足其私欲，实行专制的统治，极力压榨百姓，虽表面上仍称“尊孔”，但实际上反对孔子的“仁学”和“民主”的思想。历代的儒生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对孔子的思想从各方面进行改造，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三纲”理论和宋儒提出的“理学”影响最为深远。虽然仍打着“孔学”、“儒学”、“儒术”的旗号，但在许多方面已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历史的分析，弄清孔子学说和“孔家店”的区别。

早在西汉初年，儒家的经学就有鲁学、齐学之分。《汉书·艺文志》指出：齐学的经师“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实际上是“兼儒墨，合名法”，“博采诸家，自成一体”。例如，前面已经指出，所谓“三纲”的理论，实源于法家韩非。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本纪》）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西汉、东汉期间，孔子被逐步神化。《春秋·演孔图》和《白虎通义》等书，把孔子说成是黑帝之子，身高十尺，腰大十围，前知千岁，

后知万岁等等。因此儒家的经典也被当作讖纬神学，可以据之卜吉凶，判是非云云。对于这些闹剧，已死去几百年的孔子当然是更不能负责了。

到了宋朝，由程颢、程颐所创立，由朱熹完成的程朱理学（又称道学），进一步把“三纲”解释成为天地间永恒不变的法则——理（即道）。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同样，未有君臣父子之先，便先有君臣父子之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卷二）。人所禀赋的天理产生人的“天命之性”。人们阶级地位不同，也决定于个人气禀的不齐。朱熹说：“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衰颓薄蚀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天。”（《朱子语类》卷四）“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朱文公文集》卷14）。贵为天子，贱为下民，都是天理命定。因此，作为臣民，只能绝对服从君上的法令，否则就是非义，就是违背天理。

程朱为了把理学说成是儒学的正统，把孔孟的仁学纳入理（道）学的轨道。程颢说：“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他们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起来，程颢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24）。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13）。寡妇要再嫁么，这是私欲，当然要灭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能饿死，也不能改嫁。清戴震批判地指出：“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这些都是和天理（“三纲”）相违背的，因此，也都是要灭绝的，这就是所谓“以理杀人”。这样，程朱理学虽然打着孔子的旗号，实际上和孔孟的“仁者爱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是相违背的。程朱的这一套对于封建帝王推行的专制主义当然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南宋理宗对之大捧特捧，追赠朱熹为太师，封国公，并诏令祭孔时要增加二程和朱熹从祀，还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书，让天下士子熟读，使程朱理学控制了教育和科举阵地。后来又经过明清两代帝王（特别是明太祖、³ 康熙和乾隆）数百年的推崇，程朱理学进一步巩固了在全国的思想统治，广泛传播，毒害人民。它鼓吹绝对皇权，鼓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它禁锢人民的思想，反对一切改革。总之，它成为一切顽固势力的旗帜，起到极其反动的作用。曾国藩提出“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更把“三纲”思想推向极端。⁴

上述材料说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孔子有不同的脸谱。而历代帝王所尊崇的则是经过董仲舒、朱熹等人改造过的孔子。他们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把孔子思想中的“民本”、“民主”因素抹煞掉。例如孔子关于国君之言“如不善而莫之违也”就可能导致丧邦之祸，这个思想就多被后儒和历代帝王略去不提，以至较少为人所知；他们片面强调孔子说过的“臣事君以忠”，而抹煞“君使臣以礼”这个前提；也不提孔子“勿

³ 明太祖朱元璋，虽是贫民出身，但他一登上皇位以后，就极端专制。洪武五年，当他读到《孟子》书上有对君主不客气的话，就十分恼怒说：“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得免耶？”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洪武二十七年，又令人编《孟子节文》，将《孟子》书中关于民贵君轻等 85 条都删除了，只剩下 170 几条，刻板颁行全国学校，所删的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据吴晗《朱元璋传》）。

⁴ 曾国藩于同治二年元月二十四日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奈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半言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然后才是“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家书·喻纪泽》）。

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只是要求臣下对国君绝对的顺从；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解释成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把孔子思想中的保守因素（糟粕部分）加以膨胀、发展；把“三纲”、封建伦理道德当作儒学的正宗，用来当作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这就是五四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孔家店，这样的孔家店当然是应该打倒，也是必须打倒的。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民主与科学，起到振聋发聩、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这是主流，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五四时期的一些领导人也存在形式主义的缺点，就是认为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对问题没有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对孔子也是如此，没有把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和保守因素区分开来；没有把孔子本人的思想和经过后儒改造的“儒术”区分开来；没有把孔子和孔家店区分开来。这在当时，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的声势，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开展，产生这种缺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很难以避免的。但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却又不同。他在当时对孔子就能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他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必须打倒孔家店；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就当时社会来说，孔子“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只是因为时代变化了，所以孔子学说已“不适合今日之时代精神”；“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⁵ 李大钊在当时就能把孔子本身与历代帝王和儒生对孔子的歪曲区分开来，这是由于他已经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缘故。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一伙搞的所谓的批孔运动是一大阴谋、

⁵ 以上引文分别见《李大钊选集》第77、79、80页等。

大骗局。他们的所谓批孔，不过是为了影射、攻击周总理。他们写的许多文章大都是围绕这个罪恶目的的。因此他们往往采取歪曲史实、断章取义的手法，不可能对孔子做出正确、全面的评价。他们一伙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暴君，他们的暴行比历史上的任何暴君都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他们对孔子思想中的“民本”、“民主”、“仁学”等因素当然要尽量抹煞了。

孔子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无论精华和糟粕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真研究孔子，全面认识孔子，既不肯定一切，又不否定一切，还他本来面目，这是学术界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